

在朝與在野：1932-1936年 胡漢民與蔣介石之關係

• 陳紅民

國民黨自同盟會時期起就是一個缺乏黨內民主而又派系林立的政黨，這兩個特點導致其黨內幾乎始終存在着不同的派系，而派系間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爭甚至軍事衝突。國民黨執政後，成為黨內的主流派同時意味着取得國家的控制權，派系鬥爭一度愈演愈烈，影響國家政局甚劇。研究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是民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史學界已有相當的成果。本文試圖以胡漢民與蔣介石的關係為例，從「在朝」與「在野」這一特定角度參與討論。

以往論及1932-36年間胡漢民與蔣介石的關係，台灣學者或避而不談，或以「政見不合」概括；中國大陸學者多着眼於他們的政治主張、階級立場，或依毛澤東的論述斷定其為「狗咬狗」。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顯示了此一時期胡漢民與蔣介石關係的複雜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謂的「在朝」與「在野」，限定於國民黨內不同的政治人物與政治派別，他們都維護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但於特定的時期內在政治主張、政治目標及權力分配上有分歧。不僅中國共產黨不在論列，即使是曾屬國民黨但最終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目標的政治軍事勢力，如民革、十九路軍等，也不在討論範圍內。

以往論及1932-36年間胡漢民與蔣介石的關係，台灣學者或避而不談，或以「政見不合」概括^①；中國大陸的學者多着眼於他們的政治主張、階級立場，或依毛澤東的論述斷定其為統治階級內部的「狗咬狗」，或強調胡、蔣在政治理想、政治主張的不同^②。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顯示了此一時期胡漢民與蔣介石關係的複雜性。本文擬以這批珍貴資料為基本素材，從「在朝」與「在野」的角度觀察胡漢民政治態度的變化，特別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微妙關係，希望能對研究國民黨內派系鬥爭有所助益。

限於篇幅，文章只根據新的資料，提供一些史實與思考，就教於方家。

一 胡漢民淪為在野派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胡漢民與蔣介石曾分別掌握着南京政府的黨權與軍權，共同合作「清共」，鎮壓黨內反對派，有一段合作無間的「蜜月時期」。

1931年「約法之爭」導致蔣介石軟禁胡漢民，兩人決裂後走上對立之路。胡漢民從權力頂峰跌入低谷，離開南京，從在朝走向在野^③。

政治上的對立與個人的恩怨，使胡漢民對蔣介石恨之入骨。還在上海和會期間，他就電令粵方代表堅持蔣介石必須下台，「迫某（指蔣介石——筆者）辭職並促制度上限制個人權力，打破獨裁」^④。其後，胡漢民便一直在香港領導西南反對蔣介石與南京政府。他的政治主張是「抗日、反對獨裁統治、剿共」，其中「獨裁統治」即指蔣介石。處於在野地位的胡漢民，政治態度與處理事情的方式都有很大的變化。他為西南制訂了「對中央行為均表反對」的基本策略^⑤，幾乎在一切方面都與蔣介石對着幹，有時甚至是蠻幹。「為反對而反對」，這是典型的在野派思維^⑥。

從在朝淪為在野，胡漢民的心態行為模式發生了明顯變化，從而他的一些重要政治主張也發生了變化。簡而言之，胡漢民在南京主政期間，竭力維護「中央權威」，而在野之後，則盡可能聯合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機會反對「中央權威」。胡漢民在南京時曾強烈主張「統一」，專門對李濟深提出的「分治合作」口號進行了批評^⑦，支持蔣介石鎮壓各路抗命的地方實力派。淪為在野派後，他卻明確主張「均權」，以「分權」對抗蔣介石的「集權」，他寫了〈論均權制度〉、〈再論均權制度〉、〈軍權與均權〉等文章，為依託西南地方實力派，反對南京政府的政治活動提供理論依據。胡漢民主張西南各省聯合，「以西南結西南，……既以自保此乾淨土，亦為來日推進大局地」^⑧。除切實聯絡西南各省的地方實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龍雲、劉湘、劉文輝、何鍵、王家烈等外，還與馮玉祥、閻錫山、韓復榘、石友三、宋哲元、楊虎城等一大批北方的非蔣系地方實力派保持往來，試圖策動南北聯合反蔣的行動。

胡漢民曾竭力倡導「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在全國範圍內不許國民黨之外的政黨存在，在國民黨內不許派系出現，這是他「清黨」的重要理論基礎。但1932年後他提出「必須重新建立黨的組織，使黨成為真的革命組織」^⑨，以「反蔣最堅決的人」為核心，建立了新的秘密組織。胡漢民自視為國民黨的正統，新組織仍稱「中國國民黨」，他人多以「新國民黨」稱之。「新國民黨」以胡漢民自任主席，鄒魯為書記長，除兩廣外，「新國民黨」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地方組織，北美華僑中也有「新國民黨」組織^⑩。建立「新國民黨」有悖於胡漢民的一貫主張，所以他盡力否認。1933年底，北平法文《政聞報》記者當面問：「常見報載先生有新國民黨之組織，內情如何？」胡斷然否認：「絕無其事。余感覺以往老黨員多能犧牲，富有革命精神，皆抱義務思想，故余惟恐國民黨員之不舊，更希望新黨員皆有老黨員之精神，由此可見新字絕非余之主張也。」^⑪這是目前所見胡就「新國民黨」唯一的公開講話。他利用提問的限制，巧妙地以「新黨員」、「老黨員」之別，迴避了有新的組織這一實質。無論別人怎樣看，在胡的心目中，他的組織就是最正宗的「國民黨」。

1932年後胡漢民提出「必須重新建立黨的組織，使黨成為真的革命組織」，以「反蔣最堅決的人」為核心，建立了新的秘密組織「中國國民黨」，他人多以「新國民黨」稱之。1933年底，北平法文《政聞報》記者當面問：「常見報載先生有新國民黨之組織，內情如何？」胡斷然否認。

二 對張學良與杜月笙態度的變化

對待張學良和杜月笙態度的轉變，也頗能說明胡漢民作為在野勢力的思維與處事方式。胡漢民一直認為張學良是無德無才的紈袴子弟，由於有蔣介石

1933年初張學良因榆關熱河失守被迫去職，也成為在野派。胡漢民隨着時局的演變，試着把對張學良的政策由「去張反蔣」改為「聯張反蔣」，將其變為政治盟友。圖為1929年1月25日國軍編遣委員會會議閉幕合影。前排左三為胡漢民，前排左四為蔣介石。



出於私心的百般偏袒，才在國民黨內有重要地位。中原大戰期間，蔣介石對張學良封官許願，拉入自己陣營。胡漢民竭力阻止蔣介石委張以重任，為此兩人激烈爭執，蔣因急需張學良的軍事支持，無計可施之際，竟以辭職相威脅^⑩。「九一八」事變後，胡更要求懲辦喪地辱國、「不抵抗」的張學良^⑪。1931年底，蔣介石被迫下野後，胡漢民便把清除張學良當成另一個重要的政治目標。1932年1月3日，胡漢民自香港指示在上海的劉廬隱等人聯絡行政院長孫科：「起馮去張，同時分拆蔣、張勢力。」^⑫13日，胡漢民直接致電孫科^⑬：

弟屢電兄言，欲打開目前僵局，首當從東北革新，故起馮去張，實今日要着。且去張抗日，最得國民同情，務望當機立斷，即與煥章、德鄰兩兄密商進行，庶陰謀可破，新政府之基礎得以鞏固。

馮、煥章，均指馮玉祥；張，即張學良；德鄰，指李宗仁。當時，胡漢民等視張為仇寇，為驅逐他制訂了實現目標的具體步驟，並專撥巨款。

然而，1933年初張學良因榆關熱河失守被迫去職，也成為在野派。胡漢民隨着時局的演變，試着把對張學良的主張由「去張反蔣」改為「聯張反蔣」，將其變為政治盟友。他先後數次派人帶親筆信去北方聯絡張學良，以圖構成反蔣聯合陣線，其中7月4日託陳中孚交給張的信謂^⑭：

自榆關陷落，即得陳言同志來電，謂兄已決心抵抗，願荏苒經月，未見有實際之表現。……兄前以不抵抗而喪失東北，茲又以不抵抗而喪失榆關，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雖云負最終之責任者當別有人在，願兄身當其任，究何以自解於國人？縱不為個人計，獨不為數萬萬人民之身家性命計耶？

西南同志持抗日剿共之旨，戮力經年，限於地域效命無所，然所以期望於兄者至極殷厚，切盼毅然決然，先求華北將領步調一致，振奮一心與日抗戰，使中國不至自此而亡，則綿薄所及，必當力為應援也。

陳言為張學良秘書。信中針對張學良的實際情況，積極爭取其加入西南陣營。此信的語氣與內容，與該時期胡漢民致韓復榘、楊虎城、孫殿英等非蔣系的地方實力派的信如出一轍，可見胡已將張視為北方可聯絡的盟友。張學良也積極回應，他在覆信中希望胡漢民能不時指示，「於精神物質兩方面並予惠賜鼎助，俾得循率兼利進行」^⑩。而陳中孚給胡的秘密報告則更樂觀：「漢卿現派米、寧二人在滬，與中密商今後反蔣工作，俟漢病痊，商定切實步趨，即派人南來。」^⑪漢、漢卿是張學良；中是陳中孚自稱。

年底，張學良從國外歸來途經香港，胡漢民派女兒胡木蘭及秘書到碼頭迎接。兩人相見時，胡漢民對張學良在北方的活動期望甚高，並介紹張的秘書直接與廣東的實力人物陳濟棠討論合作細節。此後，胡、張之間不斷有人員與書信往來，張學良透過他人向胡表示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目前仍與汪蔣敷衍，免其猜忌，其計劃須與兩廣互為呼應」^⑫。可見張學良已認同了胡漢民的反蔣主張。

僅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尚不能斷定胡漢民的爭取工作對張學良日後的行動，如西安事變等（燕京圖書館所藏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表明，胡漢民與楊虎城也有密切聯繫），產生了多少直接的影響，這也不是本文的關注所在。前述過程，已足以說明胡對張前後不同的態度基本上是在野派實用主義的立場為轉移的。

對杜月笙等幫會人物的態度也是如此。學術界較為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與蔣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誼，上海幫會曾是蔣介石政權翦除異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漢民則是較為清白的政客，與黑社會應該無涉。「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卻對此一看法提出了挑戰，它顯示至少在1931年胡漢民與蔣介石徹底決裂後，胡與杜月笙、張嘯林等人走得很近。1931年底，胡漢民失勢離寧經滬南返，一般人懼於蔣介石的淫威多避而遠之，杜月笙則親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盤」^⑬。胡漢民也禮尚往來，「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中有他為杜月笙、張嘯林等祝壽應酬的內容，陳群是胡與杜之間的聯絡人。胡甚至曾企圖借助杜的幫會力量在上海抗衡蔣介石。1932年初，已下野的蔣介石策動楊虎在上海醞釀罷工罷市，以壓迫胡漢民支持的孫科內閣。胡漢民一面為孫科打氣，一面託陳群轉請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響，「將此種醞釀竭力設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負荷其任務也」^⑭。「新國民黨」在上海的秘密電台，就設在法租界內，按月向巡捕房交納1,500元的「電台保護費」^⑮。由此可見，胡漢民為擴大反蔣陣營，廣泛結交同盟軍，利用一切社會力量。而杜月笙等也是深謀遠慮，千方百計與政界各派聯絡，左右逢源。

還可以找出許多例子，說明胡漢民在野後對待他人態度的明顯變化。筆者在通讀「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的過程中，有一個較強烈的感覺：胡漢民晚年所聯

胡漢民晚年所聯合的力量，在軍人方面是西北軍舊部或地方軍閥，在黨政方面則是一些失意於蔣介石的政客。胡從前特別強調「以主義結合同志」，對這類人也基本不屑一顧。時任胡漢民秘書的王養沖同意胡要聯合拉攏這些人，是遷就環境，「是沒有辦法的事」。

合的力量，在軍人方面是西北軍舊部或地方軍閥，在黨政方面則是一些失意於蔣介石的政客。胡從前特別強調「以主義結合同志」，對這類人也基本不屑一顧。時任胡漢民秘書的王養沖教授有以下看法：胡明知不是同路人，還要聯合拉攏這些人，是遷就環境，「是沒有辦法的事」²³。

三 「抗日倒蔣」與「聯日制蔣」

抗日是胡漢民與西南的旗幟，他們在各種場合都高舉這一旗幟，並將「不抗日」與「對日妥協」當成蔣介石與南京政府最大的罪惡，不遺餘力地公開抨擊，宣稱要推倒「不抗日」的蔣介石。胡漢民固守「抗日」立場，一方面是其民族主義思想使然，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抗日」口號是當時中國鼓動民心、動員民眾最有力而簡捷的工具，幾乎所有的在野政治勢力都借用，儘管他們的目標很不一致。

日本的局部侵華，對中國原有的政治格局有很大影響。各種政治勢力必須審時度勢，確定其在是否抗日與何時全面抗日等重大問題上的態度。在野政治勢力很容易高舉起「抗日」大旗，因為他們可在全面抗戰中付出較少的成本而獲得較多的收益。當政的蔣介石與南京政府雖受日本侵華損害最大，但因為中日兩國實力的懸殊，他們在決心全面抗戰前必須權衡再三。顧維鈞曾分析蔣介石等當政者的思路：他們不願冒險加緊抗日，「是因為他們不能事先獲得國際上給予支持來應付可能出現的後果的保證。他們害怕一旦日本正式對我宣戰，封鎖我港口等等，而國際上都袖手旁觀。他們還害怕在剛剛對江西共產黨的威脅做好應付準備之時，被迫內外兩面作戰，以致腹背受敵」²⁴。同時，他們又不敢公開申明自己的觀點，「因為害怕激起公憤，推翻政府」²⁵。這種尷尬境地，正為國內的各種反對者所利用。

胡漢民和西南要抗日反蔣，蔣介石對西南的威脅時時存在，而日本勢力遠在東北華北，對西南暫無威脅，且出於分化中國的目的，還不斷拉攏西南，因而胡漢民等就有了利用蔣介石與日本矛盾，「聯日制蔣」的可能。1934年1月25日，蕭佛成寫信給胡漢民，討論「聯日制蔣」的利弊²⁶：

1934年1月25日，蕭佛成寫信給胡漢民，討論「聯日制蔣」的利弊。蕭體會到「以區區之兩省之力，抵抗全國之兵」的困難，提出接受日本的親善表示以「濟眼前急需」的建議，但同時顧慮與日本聯合後，不能控制，「支節更多，為患更鉅耳」。這體現了西南在此問題上的複雜心情。

門因數月來屨兒不斷之壓迫，而水雲又挾寇自重以攫取一切，故頗傾向於歐美派，而聯碧眼輩以拒屨。……屨方深知此意，故屢示口惠於西南，力懲反門。夫門之欲聯碧眼輩以拒屨兒，固然為其本人利害計，但屨兒之反門何常（注：嘗？）非為其自國計？蓋屨兒之傳統對華政策，為造成中國之內亂，使無力對外，得便予取予求。故在今日之中國，無論何人執中央政權，且對伊國如何恭順，如前此之張鬍子，今日之汪、蔣諸賊，皆卒在必排之列。而中孚乃謂屨之怨門尤甚於怨袁，未免皮相之論。但在今日之西南，以區區之兩省之力，抵抗全國之兵，於外交內毫無憑藉，則對於屨兒自不能不表示接受其善意，冀得濟眼前急需，即不然亦可和緩一時，不致自多樹敵。所慮者恐交成之後，支節更多，為患更鉅耳。

這裏，門指蔣介石，水雲指汪精衛，屐方、屐兒指日本，碧眼輩指英美，中孚指陳中孚，張鬍子指張作霖，袁指袁世凱。蕭佛成體會到「以區區之兩省之力，抵抗全國之兵」的困難，提出接受日本的親善表示以「濟眼前急需」的建議，但同時顧慮與日本聯合後，不能控制，「支節更多，為患更鉅耳」。這體現了西南在此問題上的複雜心情。

同年8月，蕭佛成與日本方面有所接觸後，在給胡漢民的信中再次提到「吾人在此環境之無從發展，不妨暫假其(指日本——筆者)力量以倒門」。但與日本合作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且不說這意味着將與英美等國為敵，「必歸失敗」，就是合作過程中也難免為日本借勁圖利。如日本願借款助西南組新銀行，以紓其困，可銀行成立，日方「必設一監視用途之機關，及推擴其在華南之商務，皆為題中必有之文章」。蕭佛成擔心，「苟若是，則門未倒，而吾人已為天下之矢矣」^②。

儘管如此，西南與日本的聯合仍有相當程度的進展。1935年初，日本關東軍開會決定秘密支持西南反對蔣介石的運動，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專程南下，與胡漢民、陳濟棠等見面，商談合作事宜。胡漢民等在指責日本侵華政策的同時，也同意雙方進行「經濟合作」。根據「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中透露的信息，日本人和知、鈴木、宇都宮等多次到廣州，雙方的實際合作包括日方借款幫助西南建立「華僑銀行」、提供軍事裝備等；而西南方面，則允諾撤銷當地取締日貨的機關等。

與日本聯合，畢竟與胡漢民等人堅定的「抗日」立場相去太遠，他們唯恐事情敗露將無以立足而成「天下之矢」，所以一切都是秘密進行。土肥原一行抵廣州前，西南政務委員會曾專門決議「密飭新聞檢查機關，自今日起至日本少將土肥原抵粵之日，凡新聞紙有對於土肥原有任何批評者，一律禁止登載」^③。而在撤銷取締日貨機關時，也特別強調「必善為處置，務使在表面上不得與吾人向所主張者太過相反耳」^④。

由於西南與胡漢民等人盡力保密，所以無論是當時還是其後，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段西南與日本勾結的秘密。他們的「抗日」名聲得以保全。在公開的議論中，胡漢民與西南高喊「抗日」，私下卻秘密爭取日本的軍事援助，以抵禦南京方面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此種政治主張的前後抵觸，公開與背後的矛盾，正是研究身處在野地位的胡漢民時須特別注意的。

胡漢民等在指責日本侵華政策的同時，也同意雙方進行「經濟合作」。根據「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中透露的信息，雙方的實際合作包括日方借款幫助西南建立「華僑銀行」、提供軍事裝備等；而西南方面，則允諾撤銷當地取締日貨的機關等。

四 面對「蔣介石將死」的情報

有時，虛擬的極端狀況的出現對於觀察歷史很有幫助。1934年底，胡漢民忽然得到其在上海的部下傳來蔣介石病危將死的秘密情報^⑤：

蔣之侍衛武官宣某密告汝為，蔣病不治，牙牀潰爛，骨瘦如柴，昨吐血多，暈厥兩小時，急電請德醫救治。劉峙亦飛往視疾。據醫表示不過時日問題，難度立春。汝、滄兩先生均以蔣部下文如二陳，武如何、劉、顧，

迭有表示，盼公北來主持一切。蔣最近主張和平，亦彼等主動。蔣已危殆，但如何收拾其部下？如何安定大局？均非公先來滬統籌不可。此實關黨國前途至重且鉅，遲則恐生其他變化。

汝為，指許崇智；二陳，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何、劉、顧，分別是指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胡漢民等恨蔣之入骨，曾公開表示蔣介石禍國殃民，「應先自殺以謝國人」，咒蔣早死^⑩。現在，蔣介石「死期」就在眼前，南京將出現權力真空，胡漢民又有機會重返權力核心，他會如何反應呢？

胡漢民認為一旦此事確實，則「時局緊急」，他覆電上海，要他們積極與南京聯絡，「對二陳、何、劉、顧等請其在軍事上注重剿共，同時即為安定部隊之方。政治上則弟所提出治標三事等等能於此時宣布實行，不但弟之行動不為苟且，而為蔣補牢晚，蓋收既去之人心，復一生之令譽，後此大局乃有辦法」^⑪。胡漢民一開始就表示，他本人不會「輕率前往」南京，最多在必要時派兩員大將劉廬隱到上海，鄒魯到南京。胡漢民曾計劃派女兒胡木蘭經上海到奉化，以「晚輩」身份探視蔣介石，了解其病情虛實。待一切明朗後「再定進止」^⑫。

胡漢民對此「突發事件」並不急於表態，而是憑在政壇闖蕩多年的經驗，先含糊地答覆，靜待事態明朗。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當事實證明「情報不實時」，胡的聲譽未受任何損失。胡甚至曾向他人表示擔憂：蔣介石果然病重不起，則「收拾大局亦成問題」^⑬。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胡雖反蔣，卻不得不承認蔣主持南京政府多年，地位較穩固，是不可能輕易取代的。

五 蔣介石應對在野派的挑戰

1932年後，蔣介石對胡漢民等人的態度又如何呢？

蔣介石以軍事起家，對權力孜孜以求，常常以強力（甚至是武力）彈壓黨內對手，其「強人」與「獨裁者」的形象十分突出。但在本課題研究時限的1932-36年之內，蔣介石的權力基礎已較為穩固，他也開始注意策略，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1935年長江淮河流域大水成災，蔣介石將他人捐贈建「蔣氏紀念堂」的錢，如數改捐給水災的難民，並將此事在報紙公開^⑭。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觀察到了蔣介石處事與思維方式的變化，胡適1935年著文指出，蔣介石「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已經「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胡適由此斷定蔣氏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⑮。在國民黨內也有類似的看法。滇軍將領朱培德，曾長時間與蔣介石共事，1925年在廣東的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蔣任第一軍軍長，朱為第三軍軍長。朱與蔣在資歷上是同輩，後出任國民黨軍參謀總長，在蔣手下做事，朱對蔣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他在1936年代表蔣南下處理「兩廣事變」後，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觀感：「蔣(介石)先生之心理及修養已非昔比，寬厚為其本性，近更力主和平，惜才用才，力棄宿怨。」^⑯

胡適1935年著文指出，蔣介石「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已經「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胡適由此斷定蔣氏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在國民黨內也有類似的看法。

「已非昔比」四個字，一方面說明朱對蔣的看法已變為由衷感佩，另一方面也正是蔣介石在朝多時悟出的進步。

以上各點可說明，蔣已經不完全強弓硬拉般地用武，他有時甚至會遷就黨內反對派的某些主張，作出讓步以換取政治上的主動。如因胡漢民與西南的不斷反對，蔣介石便將「五全大會」的開會時間一再延期。這其實也顯示了蔣介石一定程度的自信與處理黨內矛盾手法的變化。

具體到對胡漢民與西南，蔣介石雖如鯁在喉，急於解決，不斷施加壓力，甚至陳兵湖南威脅廣東，卻能隱忍而不發，胡漢民在世之日終未興兵討伐^⑧。反過來，蔣介石不斷向胡漢民示好，1932-36年間，蔣至少有三次派要員到粵、港等地，與胡溝通，邀其入京，以求「統一」。

1933年12月，「福建事變」發生。蔣介石懼怕兩廣與福建結盟，胡漢民去福州，便派張繼等帶親筆信到香港見胡漢民，邀胡北上。胡漢民雖痛責蔣介石，並遷怒於張繼，卻也未與福建聯合，蔣介石還是達到目的。

1934年底，蔣介石委託與胡關係素睦的王寵惠等南下，商談合作事宜。王寵惠「持有(蔣)介石親筆書及中常會委聯名書」，鄭重求胡「諒解」^⑨，請其到寧、滬「共商一切」。王寵惠北返時，胡漢民的親信李曉生隨行，伺機與南京直接談判。他們不斷向胡漢民報告，稱已與蔣晤談數次，將胡要求轉達，蔣「極願容納公所主張」^⑩。不久，蔣又寫信給胡，以「故人情殷」相感召：「黨國危機，四顧茫茫，甚盼後方同志無間彼此，日臻團結以挽垂危之局。……曉生同志轉述厚意，故人情殷，敢不心領，亦望先生為國珍重是盼。」^⑪這次溝通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雙方的對立情緒，其後，胡漢民赴歐洲療病，停止了對南京與蔣介石的直接批評。

1935年11月，延宕多時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在中央常會的選舉中，尚在法國的胡漢民被推為中常會的主席，蔣介石出任副主席，給胡相當尊崇的地位。會議結束，立即由國民黨中央將結果告訴胡漢民，促其歸國。財政部長孔祥熙給胡寄去四萬元，並稱「此係介公(蔣介石)特匯旅費，已囑原行再送，萬祈勿卻」^⑫。胡回國之際，蔣先是派魏道明為私人代表，持親筆函遠赴新加坡迎接。接着又派司法院長居正及許崇智、葉楚傖等到香港，準備直接迎胡北上，南京、上海等地還掀起了一個小小的迎胡高潮。

蔣介石這一系列動作，原因較複雜，其中確實有對胡忍讓與遷就的因素。胡漢民雖然最終未能再北上南京與蔣介石合作，但此後對南京政府與蔣介石的態度大為緩和。

胡漢民反對十九路軍與「福建人民政府」的態度頗出一般人意料。其實，他所反對的是十九路軍提出的打倒國民黨、「改國號」、「廢國旗」等措施和聯合共產黨的政策。他固執地認為，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蔣介石個人。

六 在野派與在朝派的分合

國民黨內的在野派與在朝派的分歧固然大，但他們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即維護國民黨對國家的絕對統治。如他們都主張消滅共產黨，胡漢民把「剿共」成效甚微作為蔣介石的重要「罪狀」之一。更典型的事例是他們對待十九路軍和「福建事變」的態度。

從胡、蔣關係的演化中似乎可以引伸出國民黨黨內派系鬥爭的幾個特點：一、作為鬥爭策略，在野的政治人物或勢力往往以激進的政治主張相號召，以爭取主動；二、鬥爭中佔優勢的在朝派常常為在野派留有生路，不趕盡殺絕；三、在野派有時會利用形勢，試圖用妥協方式達成與在朝派合流，共享權力的目標。

為了擴大反蔣力量，加強西南勢力，胡漢民在其政治主張受阻於廣東實力人物陳濟棠之時，曾十分熱衷於聯絡駐福建的十九路軍共同「反蔣抗日」，並促成福建與廣東廣西達成了「抗日、反蔣、實現三民主義的建設」的盟約^④。1933年底十九路軍以「抗日反蔣」為目標發動「福建事變」，並計劃「實行粵桂閩大聯合，共同倒蔣，推胡漢民出面組織獨立政府」^⑤。舉事前一天，陳銘樞、李濟深等致電胡漢民等稱，「嬴秦無道，陳涉發難於先；定國安邦，沛公繼起於後」，期望能獲得支持^⑥。胡漢民獲知詳情後，卻立即指示西南執行部：「閩變真象已明，背叛主義，結納匪黨，以組織農工政府相號召，請迅以西南黨的立場及不能苟同態度，電示海內外黨部，以正觀聽為要。」^⑦接着，他發表了《對時局宣言》，對福建與南京都進行批評，表現出「超然」的第三者立場：「余對寧閩抱絕對反對之政策，如寧方不能放棄其獨裁賣國之政策，閩方不能痛改其叛黨聯共之謬舉，則無言寧閩，不僅為本黨之叛徒，亦為國人之公敵。」^⑧

以胡漢民與十九路軍的關係及對推翻蔣介石政權的渴望，他反對十九路軍與「福建人民政府」的態度頗出一般人意料。其實，他所反對的是十九路軍提出的打倒國民黨、「改國號」、「廢國旗」等措施和聯合共產黨的政策。他固執地認為，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蔣介石個人。「黨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盡職，驅之可也，斷不能放火將祠堂燒毀。」^⑨胡漢民的理由與蔣介石鎮壓十九路軍的理由大體相似。胡漢民對寧閩「各打五十大板」，不僅不支持，反而指責十九路軍，在客觀上配合了蔣介石對十九路軍的軍事鎮壓行動，導致「福建人民政府」的迅速垮台。

蔣介石與胡漢民對待「福建事變」的着眼點不同，兩人的處境更相差甚遠^⑩，但在維護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這個基本點上卻相當一致。這就是國民黨內在朝派與在野派之間共同點。

根據前述史實，似乎可以從此一時期的胡、蔣關係的演化中引伸出國民黨黨內派系鬥爭的幾個特點：一、作為鬥爭策略，在野的政治人物或勢力往往以激進的政治主張相號召，指責在朝者施政的「保守」與「妥協」，以爭取主動，吸引支持者。在朝派總是比較被動。實際上，在野派即使在其控制的範圍內也未必就實行這些政治主張。對在野派公開的言論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差異須詳加辨析；二、鬥爭中佔優勢的在朝派或因實力有限，或出於其他考慮，常常為失利的在野派留有生路，不趕盡殺絕。在野派仍有相當多可供利用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資源，甚至可能有一塊割據的地盤和一支軍隊，一有機會就能興風作浪。這是國民黨內鬥爭延綿不絕的原因之一；三、在野派在不計後果、不擇手段地準備推翻在朝派的同時，有時會利用形勢，試圖用妥協方式達成與在朝派合流，共享權力的目標。與此同時，在朝派在動用強力鎮壓的基礎上，也會通過一定的讓步來消弭化解在野勢力。正因為他們之間有共同點，加上內外形勢的變化，政治人物之間又有着藕斷絲連的歷史瓜葛，使得在一定條件下在野派與在朝派間可以重新組合，形成角色轉換。胡漢民1936年初回國後的言行，已表現出願與蔣介石合作，準備從在野走向在朝的某種趨向。

註釋

- ① 參見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 ② 參見周聿峨、陳紅民：《胡漢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③ 關於「約法之爭」及胡漢民1932年之後的一般情況，參見註②。
- ④⑪⑬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16件；第21冊第39件；第27冊第76件；第27冊第55件；第3冊第40件；第29冊第1件；第30冊第5件；第12冊第9件；第27冊第56件；第41冊第16件；第41冊第31件；第39冊第8件；第41冊第18件；第20冊第28件；第21冊第29件；第20冊第29件；第20冊第26件；第20冊第26件；第20冊第20件；第20冊第7件；第13冊第37件。
- ⑤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二-1208。
- ⑥ 如為了與南京對抗，胡漢民不顧一切地反對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致他身邊的人都覺得「沒有道理」。見〈秘書眼中的胡漢民——王養沖教授訪談錄〉，《檔案與歷史》，1999年第3期，頁48。
- ⑦ 同註①，頁416。
- ⑧⑨ 先導社編：《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廣州：先導社，1934），頁675；689。
- ⑩ 胡漢民：〈黨權與軍權之消長及今後之補救〉，《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頁23。
- ⑪ 關於「新國民黨」擬另文專論。對其在各地的活動，可參見拙文，〈從檔案看三十年代「新國民黨」在上海的活動〉，《檔案與歷史》，1999年第2期。
- ⑫ 胡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頁107。
- ⑬ 胡漢民：〈論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11月），頁22。
- ⑭ 1998年12月20日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訪問胡漢民秘書王養沖教授紀錄。
- ⑮ 上海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號：173；目錄號：1；案卷號：171-1。
- ⑯ 同註⑥文，頁51。
- ⑰⑱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92；201。
- ⑲ 《大公報》，1935年9月8日，第3版。
- ⑳ 胡適：〈改制改革的大道〉，《獨立評論》，第163號（1935年8月）。
- ㉑ 《陸軍上將朱公益之事略》，遺墨。
- ㉒ 當時有人認為，由於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蔣介石不敢對廣東動武。「胡先生在，相當於十萬精兵，主要是他的影響大。」同註⑥文，頁50。
- ㉓ 上海檔案館藏檔案，全宗號：173；目錄號：1；案卷號：171。
- ㉔ 國民政府財政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㉕ 程思遠：《政壇回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65。
- ㉖ 王順生、楊大偉：《福建事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47。
- ㉗⑸ 胡漢民：〈對時局宣言〉，《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頁6。
- ㉘ 胡漢民對「福建事變」的態度相當複雜，他曾反對南京方面對福建動用武力和取消十九路軍番號等舉措，且一直與李濟深、蔡廷鍇等人聯絡甚密。